

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项目

理论 · 思潮 · 价值观

冯虞章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5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思潮·价值观/冯虞章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7

ISBN 7-5442-3123-2

I.理… II.冯… III.①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②道德修养—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G6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917 号

LILUN SICHAO JIAZHIGUAN

理论·思潮·价值观

作 者 冯虞章

责任编辑 张 辉

特约编辑 余 勇

封面设计 南海高教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123-2

定 价 19.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写在前面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写的文章中,挑出这30篇汇成集子,作为这些年来自己在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阵地上大致里程的一个记录。

之所以从80年代末的文章选起,是因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80年代后期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他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这里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他强调要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失误,继续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个集子中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或者说,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地位的背景下产生的。今天回头看去,难免会感到内容的单薄和分量的不足。但好在都力图理论结合实际,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重大社会思潮和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争鸣。因而仍然还有它的价值。在我来说,愿借这本集子交流这个岗位上一名老党员的心声,诠释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心中的责任。如果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战线上的同志有所裨益,特别是于思考人生、追求真理的大学生有所裨益,那将是莫大的安慰。同时,也非常欢迎广大读者批评和指正。

不巧的是,80年代后期,我的双眼先后罹患视网膜脱离症,阅读和写作都发生了很大困难。有几年,不得不请别人为我读一些材料,自己想要写什么,就反复酝酿后慢慢录在磁带上,再请别人帮助整理出来。在此期间,先后得到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周石、刘利民、袁德、王毅虹等同志的协助。

这些文章大都是发表过的,有一半是退休以后的作品。有些文章在定稿时,蒙李崇富、张步洲等同志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有的是与别的同志合作撰写的文章,已在有关篇内注明。这次汇成论文集,在保留原样的基础上,有个别文字性的改动。各篇的注释仍采用发表时的注释,未作统一处理。

作 者

甲申岁末于清华园

目 录

也谈《河殤》

——对一种历史观的讨论…………… (1)

析动乱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特点

——兼谈大学生上当受骗的原因…………… (9)

析“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16)

我们为什么研究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 (26)

人生价值理论:毛泽东思想中的一颗明珠…………… (30)

实践和坚持、发展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 (42)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55)

新时期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指南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有关论述的体会…………… (74)

论邓小平人生价值思想的精髓…………… (89)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支柱系统…………… (103)

理想·责任·价值观…………… (112)

“体制”范畴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 (119)

科学成就与科学家的哲学世界观…………… (126)

融会哲学、历史、现实、人生的尝试

——“毛泽东生平与哲学思想”课开设三年小结…………… (136)

发扬革命传统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48)

党的革命传统和古代优良道德传统…………… (165)

试谈人文精神…………… (174)

论邓小平人生价值理论…………… (186)

蒋南翔教育思想的哲学品格…………… (201)

要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 (208)

要正确地对待历史	
——写在建国五十周年前夕·····	(215)
试谈革命气节·····	(229)
论社会思潮·····	(238)
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248)
革命气节:共产党人的伟大道德旗帜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	(251)
再说价值观·····	(265)
弘扬民族精神问题的学习提纲	
——写于抗击“非典”高潮时·····	(271)
从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看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兼谈正确评价冯友兰哲学及其他·····	(277)
缘何认为清华大学在 1952 年以后“没有了哲学的身影”·····	(294)
邓小平与意识形态工作·····	(299)

也谈《河殇》

——对一种历史观的讨论^①

《河殇》审视传统时深沉的历史感使人震撼，它对待传统的非历史主义观点又使人难以接受。它以沉重的探询发人反思，又以隐晦的比喻使人茫然。诸多激情的赞扬同时伴随着理性的批评。这或许就是前一时期“河殇效应”中的矛盾现象。人们可以历数《河殇》的成就和缺陷，但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究。《河殇》的作者认为，它的突出贡献是“向至今被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束缚了眼界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河殇》的最大失误，恰恰是历史观上的失误。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纵横跌宕。面对历史的挑战，探究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项浩大的极有意义的工程。对此，以“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为己任的《河殇》是怎样来进行这种探究的呢？它基本是借助于“黄色文明（内陆文明、农业文明）——蓝色文明（海洋文明、工业文明）”两极截然对立的模式来进行的。它认为：人类文明之初，就分成了两类具有不同性质和机制的文明——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古老的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黄河文明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然而，黄河文明毕竟是一种具有隔绝机制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它遵循的是儒家的文化。这种文化，塑造了封闭、保守的人类心灵结构。这条大河历史地规定了我们文明的命运。它使中国面对历史的公平选择坐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也无从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另一种文化影响

^①原载《中国教育报》，1988年12月30日，1991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序言

的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则不同。当内陆文明还在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海洋文明就在地中海悄然崛起了;在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大都市的时候,内陆文明就因其固有的文化素质处于衰落中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扬起了科学与民主的风帆,海洋文明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而黄河文明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也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和民主。只有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重新滋润黄土地,才有可能使黄土地重新获得生机。于是,中华民族的反省触及了“种族文化选择这个最深刻的命题”。我们“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看来,作品在对历史的考察中,是以文化作为根源和最深层次的。对文化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理解。不过,无论作何种解释,历史中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当摩尔根“根据生活资料和生产的进步”区分人类史前的各文化阶段并进行对比的时候,才写出了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至于“儒家文化”或某种“心理结构”只能认作狭义理解上的文化,尽管它与社会物质生活互相作用,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东西。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在历史上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经历了多次演变。如果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最深层次的东西和决定性的因素,以这种“文化根源”来解释历史,岂不是一种“头足倒置”!再说,既是同一种文化源头、同一种文化类型,为什么华夏文明有时辉煌灿烂,有时暗淡无光?为什么它有时气度恢弘,有时衰微冷落?有时主动出击,有时畏缩退让?有时开放、进取,有时封闭、保守?这一切离开了对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从文化到文化,从心理到心理,是根本无法说清楚的,以致不免要借助于所谓“一个中

国皇帝梦见释迦牟尼”之类的附会。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作品在剖析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阻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而认为这种农业文明根本不可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因素,并援引了有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来强调:“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真正的私有制,因而资本主义萌芽也是无从产生的”。一部“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的作品,对这一涉及到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的问题,采取了如此轻率 and 主观武断的态度,是使人惊异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是否在一定阶段上孕育出了资本主义萌芽,并到近代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压抑),这里如要引用史料,不免失之累赘。不过,我不只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读过不少堪称我国史学界精英的史论,相信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可靠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是封建社会后期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自然的、必然的过程。只是在不同条件的国家,或迟或早并采取着不同的途径罢了。“威尼斯的商业精神,是连莎士比亚都诅咒的。因此,直到五百年后,英国才出现银行发行公债的做法。”我们可以问:如果说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比西欧有的商业城市晚了几百年,那么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正是西欧资本主义经过两个半世纪发展的结果吗?难道可以设想,只要由于某一主观意愿,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可以提前几百年?如果不去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对历史的见解就难免陷入一种主观随意的境地。所谓一个皇帝的梦“导致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的漫想,也盖出于此。我想,提出杜绝“主观社会学”的遗风,大概不是无益的吧。

或许可以说,《河殇》并非以文化为本,也并非主观随意地探究历史,因为它在比较两种文明时分析了孕育我们文化的黄河的地理特征,具体说明了黄河中下游这块文明摇篮地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以及它怎样塑造了我们的文明。无疑,我们承认地理环境对

决定、可塑、非可塑

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中世纪后半期。当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和德国的北部、西部已纷纷摆脱封建野蛮状态而发展工商业的时候,南部德意志却因阿尔卑斯山脉与意大利的文明隔绝。今天我们交通阻塞的僻壤,也常常成为封建愚昧的避难所。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提出的某些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地理环境作为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马克思语),而不能决定文明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不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并在改变自然界的过程中改变、发展自己。作品认为,黄河的特定地理环境“规定”了我们文明的性质、类型、命运,“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就不免落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这种历史观无疑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的内在逻辑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一面对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消极方面作正面解释,如把他主张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跳跃,说成是认为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一面却同普列汉诺夫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如关于地理环境的基本观点相左。普列汉诺夫在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的同时,正是同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划清了界限。他提出的“人为环境”的思想认为,人为环境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互相作用的产物,“这个人为的——社会的——环境,是一切进步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他还指出,人为环境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从直接变成了间接。他认为: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研究经济关系的内在逻辑,这无论如何不应当少于研究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可惜,《河殇》无视了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社会运动有其独立于自然环境的规律,从自然环境来直接说明人的性格,主要从地理背景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这种对前人思想过分明显的错释和忽略,是出于理论准备的不足,还是它的思维模式的必然结果呢?

我们且抛开以上这个问题,继续来讨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两极对立的模式的其他方面。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技术产业结构发展的角度看,人类自从摆脱了原始野蛮状态后,已经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处在比农业文明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弘扬它的优点决然无可非议。但它在这里告诉人们的是另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一类文明天生是农业文明的根,一类文明天生是工业文明的种。一个因其劣质而恶性循环,衰落于黄土地;一个因优质而充满开拓的活力,崛起于蓝色的大海。现实的一切,都渊源于这两类文明的不同素质。终于,只有抛弃一种文明,换之以另一种文明,才有出路了。用这种两极对立、相撞的思维模式来考察文明兴衰的历史,实在是大可质疑的。

世界上的事物都生生不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从而构成了无限多样的向前发展的链条。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不变的。被说成具有内在“文明优势”的工业文明,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农业文明转化来的。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部门,即使航海业发达的地中海沿岸也不能例外。近代工业革命的优胜者英国,到十六七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了大多数。正因为如此,在工业革命前,才有剥夺农民的被称作“羊吃人”大规模的圈地活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最初就是以农村为生长点的。近代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出现后,也已屡经兴衰变迁。被誉为“资本主义最早的发源地”的威尼斯,早已今非昔比,以至外国报纸说:“昔日,每当月夜泛舟河上,宛如身在水晶宫。而如今的水道变成了臭味熏天的污水沟”,“威尼斯正在死亡,正在变成一个古物橱窗”。西方工业文明在经历了三百年的发展之后,今天又有谁能说它将永世长存?西方社会的一些未来学家,已经看到了工业文明的危机,因而去研究未来,虽然我们不必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但西方社会几十年来一个又一个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工业文明行将发生更替的预测和反映。用截然对立的观点来看待两类文明,一方绝对的优越,一方绝对的低劣,或

序言

用凝固不变的观点来看待某一种文明，都无法说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明，依具体条件而发生的丰富多样的矛盾变化。那种两极对立、凝固不变的思维模式，只能把历史本身简单化，而且颇有曾在西方一度流行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味道。

当用这种两极对立的模式来思考中国历史的时候，由于蕴含着两种文明起始就有性质优劣之分，并且常常实际上是以近、现代西方文明为价值取向来衡量悠久的华夏文明，就必然导致对中华民族光荣历史的自我菲薄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作品中的“误区”说是一个很典型的观点。它说：“在我们民族的感情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这岂不是说，我们民族绵长的历史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光荣可言吗？我们仿佛也看到了作者在沉思中的苦涩心情。作品中曾不乏对华夏文明浩大气象的赞美之词，但终究还是发出了黄土地上的中华文化“纵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是难免玉石俱焚了”的叹息。这种否定一切的感叹，不能不说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结出的苦果。历史是前进的，又是不能割断的。人类历史上一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只能是不同形式的批判继承、辩证的转变，而不可能是对当前文明的彻底抛弃。李政道博士不久前在《读“河殇”有感》中指出：“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这说得何等的中肯啊！

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谈到《河殇》讨论中说得较多的忧患意识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河殇》的意义在于激发了人们的忧患意识，汇成了共赴改革、开放的创业冲动。我想，这种意见是真诚的，但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面临着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目前体制上的诸多弊端，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也可说应该有忧患意识。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尚感到岌岌可危，我国更何

能掉以轻心？过去当中国以大刀、长矛对付洋枪洋炮的时候，还自诩为“天朝上国”，这种愚昧的记录至今仍然发人深省。每当我们从困境中走出来，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的时候，就常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这种心态至今也还没有消失。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我们也就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然而，危机感也好，忧患意识也好，一是要以科学的分析为基础。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今天，也只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到繁荣、昌盛的彼岸。并不是越把自己的传统说得一无是处，就表明越有危机感。如果以情感之波代替了理性之光，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负责任地否定一切，当人们冷静下来的时候，被暂时激起的“接受效应”就会泡沫般的消失，更何谈激扬奋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意志？二是不能把激发忧患意识与树立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对立起来。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于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的表现。尊重自己的历史，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如果说，我们民族的感情上充斥了“误区”，必须重新进行所谓“种族文化选择”，那么又怎能谈得到增强民族的自尊、自强、自信意识，我们讲爱国主义岂非成了没有客观基础的假、大、空？

更重要的是，激发忧患意识，要落到一个基点，即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扬弃，急起直追。历史证明，在封建制度下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在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则以不同的途径实现了工业化。我国今天虽然还相当落后，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也就是寻找中华文明复兴之路。无奈那时所谓“蓝色文明”的生产力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所以结果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终于，经过十月革命的介绍，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新中国的成

社会主义文明复兴

立,又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国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更赋予了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我国的文化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河殇》的“全面思考”中,似乎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无动于衷,不分新中国和旧中国,一概叹息“文明衰落了”,似乎我国还停留在千百年来一贯的“农业文明”中原封未动,半个世纪来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发生,甚至还提出“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这种无视我国历史发展逻辑的“忧患意识”,确实是令人遗憾和为我们所不取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社会。在中国文明复兴的伟大历史行程中,需要不断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包括要对我们的历史传统进行反思。但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可以像选择商品花色那样随意确定。我们始终坚信,中华儿女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不是在其他貌似“新”而实则陈旧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自强、自尊、自信,必将能创造出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析动乱中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的特点

——兼谈大学生上当受骗的原因^①

一场平息旨在颠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风波的斗争已经基本取得胜利,人们还在反思它留给自己的教训。有些大学生仍然感到困惑和迷惘:为何事态的发展如此令人惊愕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也有些大学生止步于善良的初衷,未能深刻分析事态的具体进程,实实在在地去汲取终生受益的教训。

在这场风波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一方面,一部分大学生以崇尚理性自诩,自以为是理性的宠儿,在这次风波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国之心,是根据自己的思考来行事的;而另一方面,一些极端反动、阴险的策划者、组织者,则利用一部分青年学生在思想上深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影响以及缺乏社会政治经验,一步步地施以错误的引导,实际上把他们的行动纳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

本来,青年学生肯学习、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由于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备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也就很容易把披上时髦外衣的错误的东西当作新的真理。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有不少舆论阵地成了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工具,近几年来使得不少青年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侵袭;而在这次动乱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终于煽惑青年学生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而且越走越远。这就要求我们具体分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更容易迷惑青年学生的那些

^①原载《中国高等教育》,1989年第11期。

特点,并针对其特点加以揭露批判。

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表现出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空前的疯狂性。透过它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种种攻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潮是环绕着哪些问题展开的和它的某些特点,除了青年学生自身的弱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这些特点,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一、关于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和我国现状的基本估计

在这场风波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打着“反封建”和“新启蒙”的旗号,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历史以及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借口反对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蛊惑人心的逻辑是:自“五四”运动到今天,中国社会好像在原地转了一圈,甚至封建专制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更严重了。因此他们提出,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进行“新启蒙运动”,“整个地要改弦更张”。

早在这次动乱前一二年,这类观点就大量出现在报刊、书籍、特别是电视片《河殇》之中。学潮伊始,这种观点又渗透于各种煽动性的大小字报中。有的把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中世纪”,有的不加掩饰地把今天说成如同70年前的“五四”时期,有的还声言要反抗“加在几代人身上的枷锁”。在这种颠倒黑白的所谓“反封建”的煽动面前,许多不懂马列、不了解中国革命史和新旧中国根本区别的大学生失去了鉴别能力,有的甚至荒唐地认为,自己参加游行是好不容易赶了“五四运动的继续”。

必须指出,有些人以“反封建”为名,把我国今天同“五四”运动时期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

其一,“五四”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最重要的是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根本变革这种使中国人民饱受欺压和凌辱的社会制度。这一伟大任务,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所胜利完成。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和

一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压迫,也已随之根本推翻。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建国以来,我们虽然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正是因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才使得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取得了远远领先于其他条件相似国家的成就,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就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而言,也领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那种认为“五四”70年来的历史似乎“在原地转了一圈”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今天是在远远超越“五四”的新起点上,进一步开拓着中国人民光辉的未来。

其二,我国现阶段无疑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东西,我们还需要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但要看到,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在我国,封建主义的东西已不占统治地位,因此,绝不能借口反对封建主义来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道理,就如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三百多年后仍然保存着贵族的利益,美国南北战争一百多年后仍然存在着作为奴隶制残余的种族歧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一样。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只有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才能最终加以清除。

因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起“反封建”的旗号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完全是一种政治诡计。这是他们为颠覆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制造的舆论。他们还不可一世地自诩为进行这种“反封建”、“新启蒙”的“精英”,宣传惟有他们“能够与海洋文明直接对话”,他们手里握有用来浇洒黄土地的西方“蓝色文明”的甘泉。可见,他们所谓的“新启蒙”,只是妄图把中国变成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国而已。

二、关于如何看待民主、自由、人权

借谈论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反对社会主义法制,主